

吳志良 著

澳 门 政治发展史

Aomen zhengzhi Fazhanshi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学者书库·史丛

澳门 政治发展史

吴志良 著

I F A Z H A N S H I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方小芬
装帧设计 闵敏

澳门政治发展史

吴志良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5 字数 325000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80618-574-7/K·311

定价:30.00 元

序 一

在中国政府即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之际，志良的博士论文《澳门政治发展史》公开出版了。这将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澳门。

自从 1557 年葡萄牙人东来据居澳门以后，澳门历史经过一个奇特的发展过程。本书作者有一段概括性的说明：

其奇特的发展演变过程不单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形下，葡萄牙人如何神话般地在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土地上据居下来的？明清政府为何让他们‘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自治长达 300 多年，直到 1887 年才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初步确定澳门的政治法律地位？中葡两国不同时期对澳门这个特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取向和政策有什么不同？澳门在中西交通史和中葡关系史上作用如何，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扮演着什么角色？中葡民族怎样克服思想文化差异而和平共处分治？更令人深思的是，澳门又怎样面对外来压力和威胁，自强不息，屡渡难关，在 4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摇摆漂流，避免搁浅触礁而到达今天，并发展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城市？这些一直是史学界极感兴趣的题目。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澳门历史研究的成果不少。本书作者介绍了澳门历史研究的状况，并列举了 1751 年以来公开出版的 40 余种中外学者的主要著作，其中不乏资料丰富、论述客观的好

书。但是,也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时至今日,仍缺乏一部获中葡双方和澳门居民基本认同且在学术界具起码共识的《澳门历史》”。显然,作者撰写这本著作的意图在于填补这个空白。

作者说: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用政治发展理论对澳门作一番考察”。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作者在书中有所交代。他说:“综合政治发展理论的各家之说,政治发展的概念可界定为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于分化,组织渐趋于制度化,人民的动员参与支持渐趋于增强,社会愈趋于平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强,并能渡过转变期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发展过程构成一种连续现象”。根据这一理论,作者认为:“自葡萄牙人据居后,明清政府一直把澳门视为另类‘蕃坊’,居澳葡人依自身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建立自治组织来管理内部事务。至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更推行殖民管治,所以,澳门虽然从未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于中国有强大的依附性,却是中国领土内的一个政治行政异体,构成独特的‘政治系统’或‘政治子系统’。考察澳门政治发展,亦即研究澳门政治系统的变迁过程及其内外部诸因素的互动关系,研究其赖以持续生存的自我调节能力”。作者还讨论澳门政治系统变迁的动力。他说:“上层的动力主要或基本上全部来自中国和葡萄牙”。他还说:“纵观澳门历史,也未曾发生过彻底的革命,整体政治发展是一个为适应形势变化而和缓改革的过程”。以上就是作者对澳门政治发展的基本看法,也是撰写本书的基本指导思想。按照这个思想,作者将澳门的政治发展划分为七个阶段。全书分五章,论述了这七个阶段的历史和展望。

本书作者不仅梳理澳门政治发展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勾勒出澳门生存之道的基本轮廓,而且从这些研究中提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观点:“从学术意义上,澳门的历史演进也有力地证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难令人信服。”作者写道:

西方在近代之所以能够支配世界,并非因为其思想、价值和宗教的优越性,而是由于他们有组织暴力的优势。……葡萄牙虽为西方的一分子,但它缺乏武力优势,从而不得不与中华文明平等相处,葡萄牙在澳门的管理及其文化影响的存废,完全取决于中国的态度。更发人深省的是,当中国较为富强之后,十分宽容地从政治和法律上肯定承认了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的制度,并允诺 50 年不变。这点再次有力地证明,不同文明和制度是可以共存的,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可以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过协商谈判而妥善解决的。

亨廷顿是政治学界的一位权威学者,他的学说在国际上有广泛的影响。志良以明白无误的历史事实向他的学说提出质疑,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从处理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本著作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了分析。作者说:“《基本法》设计的政制模式,是现代民主政制中总统制和半总统制的混合体,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基本上分而立之,但行政长官的地位显得特别突出和超然,有点似总统制中的总统。”“行政长官高度集中权力的特点,与目前的总督很相似。他们之间的根本性差别是,总督由葡萄牙总统委派,仅向总统负责,而行政长官则在当地推选产生,包含了民主成分,故而对特别行政区负责。但从形式上,行政长官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因此,同时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这正是主权和治权合一的必然结果,也意味着澳门政制的进一步民主化。”

作者还对 1999 年后的澳门局势作出了令人鼓舞的展望:“根据《基本法》建立一个良好、高效且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就必须致力排除令人纷乱的干扰因素,创造有利的条件,维持和发展一个更多元、开放、公平的社会环境,大力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加速培养本

地政治行政精英,建立量才用人的良好机制,逐渐提高市民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并令其参与制度化。有了良好、高效和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又可促进社会政治发展和现代化,令更多的居民产生历史使命感,从而勇于承担、乐于贡献,接受时代的挑战,不断努力进取,共同将澳门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特色、人人安居乐业的城市,将澳门特别行政区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全面实现‘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远大目标。”

本书征引的资料十分丰富,这是本书的另一特色。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不仅参考了大量有关澳门历史的中、葡、英文字体的专著和论文,而且查阅并利用了大量中文和葡文档案资料。收藏这些档案的单位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外交部”档案资料库、葡萄牙国家历史档案馆、外交部历史外交档案馆、海外历史档案馆以及里斯本地理学会图书馆等。这些丰富翔实的资料,增强了这部著作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多年来,我和志良在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切磋论学,深知他在理论、文史社会科学知识及文字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又勤于思考、刻苦攻读。看到他在学术上不断进步,写出一篇内容丰富,极有创见的博士论文,我是非常高兴的。当这篇博士论文公开出版之际,我冒昧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并希望志良有更多的好著作问世。

茅家琦

1997年8月于南京

序 二

这部长达 25 万字的《澳门政治发展史》，是作者在南京大学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论文。早几年，就已从作者本人那里，知道他正在认真刻苦地搜集有关资料，精心撰写这一著作。在论文进行答辩之前，我已仔细读过，并应作者的导师茅家琦教授之约，写了评审意见。据我所知，所有评审者都给予这篇博士论文以很高评价，但是，作者仍不满足。在论文答辩通过以后，他精益求精，又一次对论文作了修改和补充。这一次，我来澳门参加由澳门基金会、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联合主办的“中国发展与生态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蒙吴志良先生赠送他的论文修订稿。我很有兴味地又重读一遍，深为作者的努力和见识所感动。

随着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日渐临近，“一国两制”在澳门将像在香港一样成为生活的现实，澳门的历史与现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许多民众的广泛关注。如本书所附“参考书目”所示，仅近十多年来出版的有关澳门历史的专门著作和资料集，中文版的就有近二十种，葡文版的有近三十种，英文版的有五六种。自从葡萄牙人进入澳门以来，已经将近四个半世纪了，还从来没有像现今这样，在短短一段时间中就用不同文字出版了这么多著作。这些著作，我只读过一部分，还有一些翻阅过。比较一下这些著作，《澳门政治发展史》一书的水准和特色便立即显现出来。

我曾专门论述过，历史认识是一种三极思维活动，一极是历史事实、历史过程本身，一极是人们藉以认识历史本体的历史资料，第三极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历史学家。这三极都具有能动性。历史

事实、历史过程并不是一堆僵死的骸骨,它的许多潜在的力量和影响,往往要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方才逐步释放和显现出来。历史资料,尽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遭到残损,但是,随着众多档案的公布,许多原先为人们所忽略的素材进入历史资料范围,以及处理历史资料手段的改进,它也会不断给人们提供新的东西。至于历史学家,他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思维能力,他的学风与工作实践,他进行研究的环境,更直接影响着他对历史资料的利用,以及他对历史真相的认知。吴志良先生撰写这部专著,发挥了他的所长,因而在历史资料的利用以及对历史真相的揭示上,都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葡两国交往已经甚久,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葡国,学者们能熟练地掌握中葡双语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先前中国学者所撰写的澳门史著作,所使用的基本上是中文资料,兼及部分英文资料,而葡萄牙学者所撰写的澳门史著作,所使用的基本上是葡文资料。资料运用上的这一偏颇,限制了研究者对于史实本身更为全面和更为准确的认识。吴志良先生的著作第一个特色,就是广泛地运用了中、葡两种文字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利用了已经出版的各种资料,而且搜集与发掘了一批重要的原始档案。作者严谨治学的态度,首先表现在他尽一切可能,搜集了相关的各种资料,使本书所依据的资料总量超过了先前同类其他著作。同时,还表现在他对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考订、辨析,包括许多注释在内,澄清了不少以讹传讹或被人们所忽视的史实。

本书以澳门政治制度的演进为中心,分作中葡交叉航行与葡人占据澳门、澳门葡人内部自治、议事会权力衰落、葡萄牙殖民管治、实现地方自治和进入过渡时期六个历史阶段,叙述了中葡居民在澳门这一弹丸之地四百多年来共同生存发展的历史。作者不同意将澳门史简单化地作为中国地方史,也不同意将澳门史简单化地作为葡萄牙海外殖民史,坚持以澳门为主体,充分揭示历史发展

的全部曲折性、复杂性,复原历史的真实情况。本书注意到影响澳门历史发展的三个主要动力,一是来自中葡两国上层,二是来自澳门下层民间的诉求,三是来自国际局势的变动。作者在说明上述六个历史时期历史变迁过程时,都努力揭示这三大动力发挥其作用的实际情况。在类型区分上,作者不囿于陈说,坚持认为,澳门既非附属于他国的殖民地,亦非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而是葡管中国领土。主权与治权的完全分离,决定了澳门的特殊法律地位及其政制特色。历史研究,贵在具有原创性、独创性,要善于从历史事实出发,提出有充分根据的新见解,从而使历史的本来面目更清楚地显现出来,就这一点而言,本书作者表现了可贵的理论勇气。在复原四百多年来澳门政治独特发展进程时,作者始终坚持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敢于在事实上作出新的概括。例如对葡人议事会时期奉行双重效忠的分析,对这时期居澳葡人为什么会一方面循葡萄牙中世纪市政传统,依照葡萄牙法律和风俗习惯进行内部自治,另一方面对明清王朝及其地方官恭顺臣服,遵守中国律例,他们这种双重效忠产生了什么效应所作的说明,非常具有说服力。对于1719年和1733年清廷两度欲将广州对外贸易迁往澳门,居澳葡人怎样错失了将澳门发展为中国一个特殊的外贸基地的机遇,书中的解释也极具启发性。

本书集中研究了澳门的政治发展。澳门地方虽小,人口不多,社会结构、社会矛盾却十分复杂。在四百多年历史演进中,在这片土地上,在政治体制的构建、政治有效管理、政治自治和政治参与方面,作出了许多具有鲜明特点的创造;在从政治上协调各种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书对于这些内容作了相当翔实的说明和实事求是的总结。今天,当人们正在具体地思考和研究“一国两制”如何在澳门真正落实时,在研究真正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推进法治和提高政治管理效率时,不难从中获得很

多启迪。对于这些内容,值得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和分析。

坚实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对澳门和世界未来深切的普遍关怀,使吴志良先生这部著作具有比之一般澳门政治史远为广阔的视野和宏大的内涵。作者没有仅就政治制度谈论政治制度,本书作者深入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层面,有力地证明了澳门特殊生存发展过程,完全是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变化及中西文化碰撞角力使然。作者从澳门的历史演进过程,展现了中西两大文明碰撞、交融的真实情景,说明了澳门作为中西文明数百年交接较量的一个独特场所,如何使这两大文明的碰撞基本上局限在平和的非暴力的范围,使这两大文明的交融虽然缓慢却能渐进地进行,从而使澳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平共处的典范。作者从学术意义上证明了,只要西方文明放弃了它向来所自居的政治、军事或宗教、文化上的中心主义、优越主义、自大主义,像葡萄牙人在澳门那样只求经济上互利共荣,而不刻意强求建立其政治、军事或宗教、文化上的支配地位,那么西方文明就可以与非西方文明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作者还通过葡萄牙同英、法等国的比较,证明了西方列强在近代之所以能够支配世界,并非因为他们的思想、价值、宗教真正高过于非西方世界,而主要依靠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葡萄牙虽然为西方的一分子,但缺乏武力优势,但也正因为如此,它能和中国用较为和平的办法解决双方的分歧,使两种文明得以共处。这些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于新世界秩序的构建,不同文明的沟通与理解、共存与互补、交流与再创造,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近几年来,吴志良先生在澳门历史和澳门现状研究方面,已有不少建树。他已先后出版了《澳门政治制度——沿革、现状和展望》、《澳门政制》、《东西交汇看澳门》等多部著作,主编了《澳门论丛》、《新澳门论丛》、《濠海丛刊》、《澳门法律丛书》和参与主编了

《澳门丛书》、《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法律比较丛书》等多种丛书。他还积极推动澳门基金会组织各方面力量就各相关课题开展研究,对于澳门研究从冷门变为一门显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吴志良先生是一位历史学者,更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是澳门现实变动与进步的积极参与者。这些活动当然要占去他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正因为他不是当代社会变迁的旁观者,他就有着那些旁观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强烈的现实感,以及对澳门和世界未来发展深切的关怀,而这一切,则给了他从事历史研究以巨大的动力,使他的历史认识、历史思维充满活力和创造精神。埋头书斋、不问世事、精心在故纸堆中爬梳的学者,值得人们尊敬,而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革新前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者,我以为更值得称道。这两种学术研究不应互相排斥,而应当相得益彰。事实上,对历史没有深切了解者,不大可能会对现实有全面准确的认识;同样,对现实茫无所知或只一知半解者,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先前历史发展的真谛。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当然需要保持一定距离,但这主要是为了使研究者不以局限性极大的功利影响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公正性,而决不意味着不需要对现实生活作切实的全面的深入的考察,因为历史的真谛,往往正显现在人们所生活的现实之中。我相信,《澳门政治发展史》一书的出版,必定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沿革还有不少部分几近空白,研究中盲点还不少。澳门本地所保存的大量原始档案和珍贵资料,还没有好好清理、发掘和利用。至于澳门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更是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深盼在吴志良先生的努力和带动下,在未来若干年内,所有这方面都获得新的突破。这将是人们正在谱写的澳门历史新篇章的重要构成部分。

姜义华

1997年9月10日于澳门

序 三

我早在为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学术随笔论集作序时就曾指出，“毋庸置疑，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仅提出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更为严肃且认真的研究，因为只有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我们才有可能将上述问题提升为有意义的理论假设，而且还需在具体的研究中对这些假设进行经验层面的检验。”这段文字不仅意在揭示志良在思考澳门问题时设问方式背后的问题结构和思维方式，进而洞见会影响他回答这些问题的路径和解释模式，而且更意在对志良就澳门问题做出理论层面思考的期望，亦即希望他在研究澳门问题的知识传统中做出他自己的“知识增量”。

所幸的是，仅在一年半以后，我前往澳门主持由澳门基金会、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联合主办的“中国发展与生态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期间，我就阅读了志良几易其稿的博士论文，即《澳门政治发展史》。返京以后，我又认认真真地把志良的这部大作读了两遍，个人以为，《澳门政治发展史》一书实是志良对其早期观点的深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是他对《东西交汇看澳门》一书中的问题所做的理论回答。

志良所著的《澳门政治发展史》，乃是一部从宏观历史社会学的架构出发探讨澳门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专著。由于该书的叙事方式是历史的，而且辅之以大量翔实的档案馆材料和其他论者的研究文献为基础，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讲，《澳门政治发展史》一书的最大特点往往被认为是历史材料的丰富以及作者经由这些材料而表现出来的说服力。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历史材料本身

并不是志良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也不是他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而且由这些历史材料勾连而成的澳门政治制度史也只是志良在其知识支援下对历史材料进行选择 and 归类的结果。这就是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根本要旨所在,也是当下著名社会理论家布迪厄所言的“经验现象与研究对象”之区别的关键所在。据此,个人以为,解读《澳门政治发展史》这部著作的重要之处,在于把握作者所试图回答的理论问题,洞见支配作者选择材料和处理材料的研究路径或分析框架,以及作者经由此一研究所可能具有的理论贡献。毋庸置疑,对志良这部著作可能具有的理论贡献的分析,当包括对其间所存在的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的揭示。

一、以澳门本身为主体的研究路径

大凡学术研究工作,都是在学术传统中展开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展开相关的研究之前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研究而对这一学术传统做出自己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学术传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学术研究也在其间获得了它自身的意义。依据此一道理,志良的《澳门政治发展史》首先展开的就是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反思,并通过分析和反思进而确定了他研究澳门的路径。众所周知,自葡萄牙进入澳门以来的四个半世纪期间,有关澳门的研究层出不穷,一如《澳门政治发展史》所附“参考书目”所示,仅近十多年来出版的有关澳门历史的专著和资料集,中文版的就有近二十种,葡文版的有近三十种,英文版的有五六种,但是在这些研究论著中,套用志良的话说,“时至今日,仍缺乏一部获中葡双方和澳门居民基本认同且在学术界具起码共识的《澳门历史》”。

澳门研究之所以出现这种境况,学者们各有论说,然而我个人

以为,最为重要的原因乃是论者的研究路径所致,具体来讲,也就是志良在《澳门政治发展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长期以来,澳门史研究与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一样,存在着明显的双轨……中葡学者对‘澳门史’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中国学者一般将澳门史视为中国地方史,虽有其特殊性,但本质不变;而葡萄牙学者也向来把澳门史作为海外殖民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如人们所知,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的发展趋向主要就是美籍政治学者邹谠教授所言的从权威政治系统向全能政治系统的发展,因此采取那种将澳门史视作中国地方史的研究路径,就无从解释澳门自身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非全能政治的发展取向;而葡萄牙的相应发展趋向则表现为全能政治的发展和海外殖民统治的扩张,因此采取那种将澳门史简单视为葡萄牙海外殖民史的组成部分的研究路径,也无法解释澳门自身发展中的所谓“分而治之”的现象。正是立足于此的思考,志良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澳门史研究虽不可避免地以中葡两国作为重要的参照系,大量涉及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但必须力求以澳门为主体,真实反映中葡(包括其他民族)居民在澳门地区共同生存发展各个方面的历史,华洋不可排斥偏废,双轨定要交汇合一”。这就是志良在其专著中所确立的以中葡两国发展为参照系但却以澳门自身发展为主体的研究路径;显而易见,这一努力不仅一方面为澳门史研究的学术传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而且在另一方面也为志良自己真切地洞见和把握澳门的“内部”发展进程提供了某种可能的渠道。

二、“和谐共存”抑或“文明冲突”

在揭示志良所著《澳门政治发展史》一书的研究路径以后,我们需要即刻指出,研究路径的确立,只是志良洞见和把握澳门发展历史的一种可能渠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研究,在我看来,并

不是一种“为历史而历史”的研究,这是因为纯粹“为历史而历史”的研究,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似不可能,而且即使可能,也无从反映出论者的当代理论关怀。因此,对于一项历史研究来讲,在研究路径确立的前提下,还需要对研究中的具体理论问题加以确定。从这一角度来看,确定具体理论问题,便是志良所著《澳门政治发展史》一书所做的第二项努力。当然,一如我们所知,志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恰如他所言,澳门“奇特的发展演变过程不单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形下,葡萄牙人如何神话般地在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土地上据居下来的?明清政府为何让他们‘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自治长达300多年,直到1887年才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初步确定澳门的政治法律地位?中葡两国不同时期对澳门这个特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取向和政策有什么不同?澳门在中西交通史和中葡关系史上作用如何,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扮演着什么角色?中葡民族怎样克服思想文化差异而和平共处分治?更令人深思的是,澳门又怎样面对外来压力和威胁,自强不息,屡渡难关,在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摇摆漂流,避免搁浅触礁而到达今天,并发展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城市?这些一直是史学界极感兴趣的题目”。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问题只是志良认为澳门发展中所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这些问题视为是志良的专著所要回答和解决的理论问题。综观《澳门政治发展史》一书,个人以为,志良所要挑战或论辩的,一方面乃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晚近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亦即他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撞与世界秩序的重构》(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一书中指出的,在冷战以后,文明之间的冲突必然替代以意识形态为支撑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甚至会导致新的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则是西方以现代化

理论为依凭的“西方文明普遍论”，这种论点在否定地方性知识的前提下主张西方的价值和制度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普世性，毋庸置疑，志良所要批判的还有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体认西方文明过程中的非理性观点，而这种非理性观点的两极便是“全盘西化”论和“全盘反西化”论。正是志良所具有的这种对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论关怀，促使他在以澳门为主体的政治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理论观点，即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共存”论。这就是志良所明确指出的，“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乃因为澳门不仅‘实为泰西通市之始’，还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平共处的典范，为国际政治发展与合作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这难道不值得当今世界或因经济、或因宗教、或因种族而大动干戈的国家或地区效仿？”

志良依据澳门历史经验而提出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是许多其他论者所关注的一个具有时代性的理论问题。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志良与其他论者不同，他在回答其所确定的理论问题时，采取的方法并不是一般论著所采取的那种只对中葡居民在澳门社会和平共处做事实描述的方法，或者那种对不同文明间和谐共存理想做应然建构的方法，相反，他所采取的乃是对中葡居民如何在澳门社会和平共处进行探究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追究“如何”，而非追问“实然”或“应然”。正是这种讨论“如何”而非追问“实然”或“应然”的方法，决定了志良在《澳门政治发展史》一书中不满足于对澳门历史事实做简单的描述，而是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对这些历史事实如何形成的原因加以追究，并在此一追究的基础上推论说，“只要西方文明抛弃其向来所表现的政治、军事或宗教、文化优越性，是可以与非西方文明和平共处的，葡萄牙人可以长期在天朝的土地上生存，根本的原因是面对强大的中国，只求经济互利共荣，不刻意也难以表现其政治、军事或宗教、文化的优越性。”